



【綜合討論】

運動、國家認同與發展

●蘇芳誼記錄整理

與談人：石明謹／台灣足球發展協會理事長

石明謹理事長強調，現代奧運的主基調在強調運動的最高價值就是愛與和平、性平與相互理解，但若回到歷史脈絡來看，其實運動與軍事活動有相當大的關連，無論是馬拉松賽跑、攀越障礙、跳高、擲標槍，甚至丟鉛球等運動競賽的項目，都與軍事訓練或城邦間的競爭有密切關連。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競技活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於鍛鍊男性公民的身體素質，使其具備成為一位戰士的強健體魄。顯然，早期運動競技被視為男性身體與戰鬥能力的展現，其目的是將人訓練成戰爭的機器，即使現代奧運在法國興起，也同樣帶有希望強化法國國民的體質、提升民族競爭力的時代背景，女性自然被排除在這套以軍事目的為核心的競技體系之外。

石理事長指出運動被賦予和平與友誼的理想，與促進和平與國際交流建立連結。其實，炸藥的發展歷程與奧運的發展過程，兩者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類似之處。炸藥並不是只有單一用途，它可以用來戰爭與殺戮之用，同樣它也可以幫助人類，滿足挖掘隧道、拆除老舊建築等工程建設所需。由此可見，奧運是一體兩面，原本就不是為了促進人類的和平而來的，反而是人類後來發現運動可以作為促進世界和平的事務。

石理事長引述林玫君教授演講的內容提到，冷戰時期奧運一度被美、蘇兩大陣營，拿來當作抵制敵對陣營的政治工具；林佳和老師也在許多場演講中，多次提到慕尼黑奧運發生以色列的運動員被綁架、被殺害的慘劇，導致奧運會淪為恐怖慘案的象徵。這些都是奧運會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剛剛提到2022年中國在北京主辦冬季奧運，其實在冬奧開幕之前，中國領導人與俄羅斯領導人普丁曾經見了一次面，2月20日冬季奧會結束不久，2月24日也就是冬季奧運結束四天之後，俄羅斯正式出兵入侵烏克蘭。當時很多人合理推論，在冬奧正式開幕之前，俄羅斯與中國早就講好了，等到北京冬奧一結束，俄羅斯立刻發動戰爭，否則北京冬奧進行期間發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冬奧如何進行下去？國際奧會被迫面對處理是否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出賽？還是烏克蘭的運動員無法參加北京冬季奧運的兩難困境。由此可見，在運動背後存在著許多政治上的算計，不僅如此，也涉及經濟、產業、軍事等的關係。

隨後，援引國際知名的運動作家Andrew Zimbalist所撰寫的著作—《奧運的詛咒》（*Circus Maximus: The Economic Gamble Behind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up*），該書批判歷史上每一個主辦奧運會的國家都面臨財政、經濟發展與公共資源分配的高度風險，表面上雖然很風光，但是奧運會可能出現的風險，包括：運動員因為種族而被歧視、被迫害，有的國家運動員可能因為發生戰爭無法參加奧運會、有的國家因為抵制奧運會導致運動員無法參賽，也有因為主辦奧運會的城市，財政過度支出導致破產，這些問題都曾在每一屆奧運會發生過。由此可見，我們期待透過運動可以促進和平，但在此之前，我們無法迴避在運動背後，實際存在很多很多的問題，因此必須綜合考量運動的問題，才能夠利用運動來推動國際和平與促進國際交流的目標。

石理事長又介紹另一位著名的體育作家David Goldblatt，他發表過一本暢銷書*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該書是從全球史、帝國、民族主義、階級、政治與文化等角度，回顧現代足球的發展，討論足球運動如何造成英國國內鬥爭的傷亡，以及足球是如何成為全世界最熱門的運動。在台灣，我們常說「球是圓的」一意思是指球賽尚未真正結束，最終的結果會如何？必須要到最後一刻才會知道。不過，這一本著作所傳達的意涵是指，圍繞在這個球之上的議題，不是單指球賽本身而已，而是包含所有與運動相關的東西。此外，英國將每年的11月11日訂為和平終戰紀念日，目的是紀念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日子，為此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English Premier League，簡稱EPL）比賽前，都會邀請老兵或是當地知名的人士前來開球，紀念第一次與第二次大戰中不幸身亡的軍人。他們在足球場上的紀念活動，雖然被國際足球總會（FIFA）視為違規的政治表態而被罰錢，但是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覺得罰錢這件事一點也不重要。顯然，在運動場域一定會牽涉到政治表態，所謂「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石理事長提問什麼是奧會運動的本質？首先運動競賽必然伴隨勝負，而勝負本身往往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對個人而言，勝利不只是競技表現的成果，也關係到運動員的榮譽、利益與未來發展機會；對社會而言，勝利更可能被轉化為族群認同、國家意識與社會凝聚的重要力量。以1986年世界盃足球賽阿根廷對英格蘭之戰為例，這場比賽之所以對阿根廷具有特殊意義，乃是因為1982年4月至6月，英國與阿根廷因福克蘭群島主權爭議爆發戰爭，阿根廷最終戰敗。福克蘭群島戰爭結束後，阿根廷在世界盃八強賽中以2：1擊敗英格蘭，這場勝利因而被賦予強烈的民族情感與象徵意義，也讓運動場上的勝負超越了單純的比賽結果，成為國族情緒與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反過來說，運動場上的失敗也可能引發社會的挫折感、失落感，甚至造成集體情緒的低落。這正說明，運動並不只是競技活動，它同時具有強大的政治想像力與社會凝聚力。

近期另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則是伊朗是否參加2026年在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共同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在美國、以色列聯手與伊朗發生衝突，伊朗參賽問題受到國際關



注。外界一度討論伊朗是否可能拒絕參賽？但伊朗官方對外宣示，他們將「抵制美國」，但不抵制世界盃，顯示伊朗仍傾向參與賽事。這樣的情境也讓人聯想到1998年世界盃，美國與伊朗同組交手，伊朗最後以2：1擊敗美國。由於兩國長期存在政治對立，這場比賽被賦予高度政治象徵，伊朗的勝利也引發國內強烈的喜悅與民族情緒。2026年世界盃美國與伊朗雖然並未在小組賽同組，但是兩隊仍可能在淘汰賽相遇，其後續發展值得持續觀察。

其次是參賽資格的問題。任何國際運動賽事，都會設定一定的參賽資格與代表身分，亦即選手或隊伍究竟是代表哪一個國家、地區或政治實體出賽。這種在賽事中被承認的代表資格，不只是競技上的制度安排，也象徵著一個群體在國際場域中的身分認同與集體歸屬。第三則是國土面積大小與國家實力強弱的差異，在運動場域中可能被重新定義。平時國際社會關注的往往是大國的政治、經濟與金融影響力；然而，在運動賽場上，只要選手贏得冠軍，不論其代表的是大國或小國、強國或弱國，這個國家的旗幟、名稱與象徵都會在國際舞台上被看見。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運動員在奧運奪金、站上頒獎台，看見旗幟升起、聽見國歌奏起時，會感動落淚。那一刻不只是個人榮耀，更是其所代表的國家與人民被世界看見。對台灣而言，雖然國際賽事中升起的是中華奧會旗，社會內部對此也有不同感受，但升旗的瞬間仍可能觸動許多人的情感與認同。

石理事長接著指出，運動也涉及區域歸屬與政治角力。以足球為例，台灣早期在國際足球組織中的會籍安排，曾受到國際政治現實影響。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洲足球體系中的政治壓力，台灣一度被排除於亞洲區之外，轉往大洋洲區參與賽事。以色列也有類似經驗。以色列曾是亞洲足球總會會員，後來因中東政治因素與周邊國家的抵制，被迫離開亞洲足球體系，曾參與大洋洲區資格賽，最後轉入歐洲足球總會。這些例子說明，體育區域組織的歸屬並非單純的地理分類，而是國際政治角力的結果，也會影響國族認同、國際能見度與民族自信心。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巴西舉行時，阿根廷社會上下對國家隊賽事的高度關注，充分顯示足球是如何凝聚國民情感。阿根廷國家隊出賽當天，全國人民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比賽上，學校內的師生皆無法專心上課，最後政府決定配合比賽進行課程調整。阿根廷教育部長曾以公民教育為例指出，愛國教育是學校的重點課程，什麼是愛國教育？學生恐怕不容易完全瞭解，但是只要親眼看過一場阿根廷國家隊在世界盃賽場的比賽，他們自然就能感受到國家認同的力量。這種國家隊贏球時，舉國歡騰，人民共享榮耀；一旦輸球，社會也會陷入失落與難過的感受，是實實在在發自內心而來，可以將每一個人共同體意識凝聚起來。

最後，石理事長再次回到運動的本質加以說明。他指出，運動從一開始的起心動念，就不是單純的競技活動，而是牽涉到政治、軍事力量的展現，以及國家形象與集體意識的建構。然而，也因為運動具有高度象徵性與群眾動員力，國際社會乃思考是否能透過這種「沒有硝煙的競爭」，促進國際交流與和平。他進一步指出，運動之所以能夠

凝聚各國人民的民族認同與共同體意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背後往往涉及民族情感、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產業發展與國家形象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正如*The Ball is Round*一書所揭示的，運動從來不只是運動本身，而是承載了政治、社會、文化與歷史等複雜意涵。

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運動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以適切的方式加以展現，便能一方面透過運動促進國際交流、對話與和平；另一方面，也能在這個過程中，凝聚自身的國族認同，強化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與談人：徐正賢／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秘書長

關於運動促進和平的議題，徐秘書長指出1896年現代奧運開始之後，有五次奧運會因故停辦，原因是發生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接下來1916年的柏林（London）夏季奧運、1940年赫爾辛基（Helsinki）夏季奧運、1940年加米施（Garmisch-Partenkirchen）冬季奧運、1944年倫敦（London）夏季奧運、1944年柯爾蒂納丹佩佐（Cortina d'Ampezzo）冬季奧運等不得不停辦。由此可見，戰爭才是影響奧運舉辦與否的關鍵，這也是現代奧運為何一再重申和平乃是全人類應該服膺的普世價值。

儘管如此，無論奧林匹克運動會、各項運動項目的世界盃，甚至是最近舉辦2026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簡稱WBC），這些沒有硝煙的競技性運動，雖然重視和平、友誼以及性平等舉世人類服膺的普世價值，但是這種運動團隊間對抗，甚至擴大到國家之間的對抗，凸顯運動仍不脫離戰爭的本質。

今天的主題之一是世界棒球經典賽，這是國際棒球重要的賽事，最早在2006年3月舉行，2013年當時人氣正夯旅美職棒投手王建民加入台灣代表隊，2023年在台中洲際棒球場舉辦第一輪的預賽，只要有台灣球隊出賽的場次，熱情的球迷到場加油呼喊，一定是聲音震天，熱鬧非凡。2024年WBSC世界12強棒球賽（WBSC Premier 12），台灣隊在東京巨蛋獲得歷史性冠軍，大批台灣球迷將現場化為「台式應援」主場，高舉Team Taiwan旗幟，吶喊應援曲，創造了令人震撼的客場主場化景象，嚇壞了全世界。大家都很意外，東京巨蛋應該是日本的主場才對，怎麼會主客易位，變成是台灣的主場？回顧台灣棒球的發展歷史，從早期的紅葉少棒隊，到1984年洛杉磯（Los Angeles）奧運會贏得棒球項目的銅牌、以及1992年巴塞隆納（Barcelona）奧運會棒球（正式項目）銀牌。嚴格來說，棒球在台灣的普及度未必是參與人口排名前三名的運動項目，受到外部場地不足、器材需求與花費較高，以及棒球體育班制度等因素影響，真正投入棒球訓練與比賽的人口其實並不算多，但是看棒球、關心棒球的人卻是不可思議的多，近幾年來台灣職業棒球的發展可見端倪。

徐秘書長強調長期以來，台灣受到中國的外交打壓，對外參與國際事務處處碰壁，讓全世界看見台灣成為大多數人的共同期待。這幾年台灣的職業棒球蓬勃發展，台灣各



級棒球代表隊在國際體壇的表現有目共睹，WBSC世界12強棒球賽奪冠，對台灣人帶來無比的榮耀。不管你的政治傾向是偏藍、偏白、還是偏綠，我們都非常期待台灣的棒球代表隊在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有好的表現，自然會在大型的國際賽會上，竭盡所能表達我們的強力支持，甚至拿出國旗來揮舞，展現我們的國家認同。

在大型的國際賽事上，大多數國家都會利用機會展現自己國家的政治實力或國際影響力，我們無法抹滅、也沒有辦法假裝沒看到國族主義的展現。由於舉辦任何奧運或全球大型運動賽事，為了興建大型運動場館，免不了需要投入鉅額的經費。尤其是近幾屆奧運結束之後，主辦國往往出現會入不敷出的窘境，國家財政赤字愈加惡劣，2004年的希臘雅典奧運就是一個具體案例。這樣的結果導致有意舉辦全球運動賽事的國家愈來愈少，反倒部分中東較富有的國家，看中透過這些國際賽事可以展現主辦國政經實力與擴大國際影響力的好處，愈來愈多中東國家來積極爭取主辦重要的網球與高爾夫等運動比賽。

眾所矚目的世界盃足球賽，即將於2026年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等國內十六個城市進行，接下來2028年7月夏季奧運也會在美國洛杉磯開幕。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總統雖然一再表示不歡迎跨性別女性運動員（Transgender Female Athletes）參加女性運動比賽，也拒絕十二個受旅遊禁令影響國家的選手入境。但是，美國聯邦政府又通知各國領事館，表示參賽的運動員與教練是豁免的，只是採訪的記者與觀賽的民眾並沒有豁免。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值得觀察，自2023年之後，美國一直以「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World Anti-Doping Agency，簡稱WADA）缺乏透明度與獨立問責機制，拒絕繳納會費。為此，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強硬表達假使美國繼續拒絕繳交會費，他們將發起禁止美國川普總統與美國政府的高階官員出席奧運的活動。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的說法很不給美國面子，美國政府強硬回覆該組織沒有這個資格限制美國官員出席奧運，這個就是「政治角力」。從上述內容可知，無論是奧運舉辦的初期、前期、中期，甚至後期，無硝煙的戰爭是無時無刻都在發生。包括：我們在巴黎奧運的現場，揮舞台灣國旗的民眾被保全人員請出會場，無獨有偶，2026年3月在澳洲舉行的亞洲盃女子足球賽，發生教練帶領球迷應援而被保安人員驅離球場的爭議事件。反觀，我們在東京觀看世界棒球經典賽的現場，許多人揮舞著台灣國旗卻沒事。顯然，同樣都是國際賽事，不同主辦方處理相同的事件卻有不同的標準？有人會說因為中國並未取得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會內賽資格，導致同樣是服膺1981年《洛桑協議》的精神，但是真正在執行上還是有一點點的不同。顯然，這就是所謂的「政治角力」或在該項運動場域中實力強弱的差別。

徐秘書長重申，無論是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或是部分職業運動賽事的現場，經常都會成為政治意識、國家認同展現的場域，這是現代體育發展中難以迴避的現象。雖然追求人類和平始終是現代奧運所強調的重要精神，奧運的發展歷程也不斷揭示和平的普世

價值；然而，歷史同時也提醒我們，現代奧運發展過程史中，曾有五屆奧運會因戰爭而被迫停辦。由此可見，運動雖然具有促進和平與交流的理想功能，但仍深受國際政治、戰爭衝突與國家利益的影響。即使如此，不同時期的奧會主席對運動促進和平這項議題的關注度也有所不同。2013年至2025年擔任奧會主席的巴赫（Thomas Bach）相對較在意運動促進和平的重要性，但是，1980年至2001年擔任奧會主席的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就不是很在意。所以，同樣是國際奧會，有時候對同一議題的認同感也會不同。甚至，美國川普總統作為2028年7月夏季洛杉磯奧運主辦國的總統，針對由國際奧會所舉辦重要的運動賽事。仍然可以恣意對外發言，或透過政治手段來抵制奧運。

徐秘書長接著舉出疫情期間發生的一起案例與大家分享。塞爾維亞網球界的傳奇球星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即使當時已是八屆澳洲網球公開賽（Australian Open）男單冠軍得主，仍因未依澳洲入境防疫規定完成疫苗接種，遭澳洲當局取消簽證並遣返，無法參加2022年澳洲網球公開賽，此事在國際網壇引發高度爭議。無獨有偶，2022年溫布敦網球錦標賽（Wimbledon Championships）也出現另一個受到國際政治局勢影響的案例。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當時全英草地網球俱樂部（All England Lawn Tennis Club，簡稱AELTC）決定拒絕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選手參加2022年溫布敦賽事，使溫布敦成為當年四大滿貫賽事中唯一採取此項禁令的賽事。此一決定隨即引發職業網球協會（Association of Tennis Professionals，簡稱ATP）與女子網球協會（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簡稱WTA）的反彈，兩大組織因此決定取消該年度溫布敦賽事的世界排名積分。換言之，即使選手在該屆溫布敦取得單打或雙打冠軍，並獲得高額獎金，其成績仍不列入世界排名積分計算。這項處置對選手的影響相當深遠，部分選手即使在溫布敦表現優異，仍可能因積分未獲承認而導致世界排名下滑，進而影響後續賽事的種子排序、參賽資格與職業發展利益。由此可見，單一國際體育賽事並非只是單純的競技平台，也可能在特定政治事件或國際衝突中作出明確表態；而這樣的表態，往往又會進一步牽動運動組織、主辦單位與職業選手之間的權益關係。

徐秘書長總結指出，促進和平固然是人類社會應當追求的重要價值，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現代國際運動賽事的現實運作中，要將和平置於最優先的位置來實踐，其實並不容易。儘管如此，我們仍應持續提出清楚而有力的論述，凸顯和平作為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同時，也必須真誠面對一項基本事實：任何國家一旦發動戰爭，終究都會對區域穩定、國際秩序與人類和平造成嚴重衝擊。也正因如此，在討論國際運動與和平的關係時，不能只停留在理想層次，更應將戰爭對和平的破壞納入嚴肅思考。

與談人：林佳和／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佳和教授指出，聆聽林玫君教授精彩的演講之後，讓他聯想到十九世紀法國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提倡自由貿易促進和平的主張，可以用一句話來

代表：When goods do not cross borders, soldiers will. 意思是：「當商品無法跨越國境時，軍人就會跨越國界。」這句話所揭示的意義，代表兩國之間若能夠透過貿易交流建立相互依存的關係，往往有助於降低敵意與衝突；相反地，若國際經濟往來受到阻隔，將促使國與國之間的對立與緊張，甚至走向軍事衝突。因此，國際貿易的流通與市場自由開放，具有經濟上的意義，也可能發揮促進和平的功能。根據上述的論述，其實運動應該可以達到促進和平與交流的目的，很可惜在現實國際處境下，即使「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簡稱IOC）是全球運動體系中最重要的組織，仍然無法脫離國際關係的影響，使得運動能純然表現它的本質，達到促進和平與交流的理想目標。

林佳和教授補充說明，林玫君教授探討運動促進和平之外的另外兩項議題——運動與國際政治的關係、運動面對的挑戰進行討論，最後再回應「綜合座談」單元所設定探討國家認同的問題。第一、從奧運會的舉辦與國際政治的關係談起：總部設於瑞士洛桑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是全球運動體系中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各個國家的奧林匹克委員會，包括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都在這個體系之內。國際奧會雖然以推動國際運動發展，促進各國交流為宗旨，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無法擺脫在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中目的性思考的影響。試問：1936年的奧運會為何選在柏林舉辦？主要是當時納粹德國積極爭取，它別有居心將奧運會舉辦，當作是展現國家形象與政權宣傳的重要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奧運會又被賦予讓軸心國重返國際社會的象徵意義。例如，1960年羅馬奧運，被視為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義大利重返國際舞台的重要案例。1964年東京奧運，則是第二個例子，代表日本戰後重建完成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接納。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是第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舉辦的奧運會，帶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至於，1972年慕尼黑奧運，以色列奧運代表團遭受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成員攻擊，最後釀成重大傷亡。這次重大的攻擊事件，凸顯西德政府主辦大型國際賽事安全維護與反恐應變的不足，影響所及，使得各類國際大型賽事主辦國加強對選手的安全維護。1988年漢城奧運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首次舉辦奧運會的代表，隨後1992巴塞隆納奧運、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陸續舉辦，2000年雪梨奧運是南半球國家第二次舉辦奧運會。2004年雅典奧運會，雖然回到它的原始發源地舉辦，但是雅典奧運會被視為奧運史上最失敗的奧運會之一。接著，2008年北京奧運、2012年倫敦奧運，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再到2020年東京奧運，因為COVID-19疫情爆發延至2021年舉辦，再到2024年的巴黎奧運，凸顯財政問題已是主辦國無法解決的頭痛問題。

林佳和教授進一步提問：當一個國家本身並不民主，甚至以國家暴力壓制民主運動、迫害人權時，它是否仍有資格主辦標榜和平與公平競爭的奧運會？這個問題在現代奧運史中一再浮現。1968年墨西哥奧運舉行前夕，墨西哥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甚至不惜

在墨西哥市廣場屠殺人民，與標榜世界和平與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形成強烈的對比。同樣的矛盾也出現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隔（1980）年蘇聯依然主辦莫斯科奧運，一個入侵其他國家的政權，有資格舉辦以和平為訴求的奧運會？引發美國發動杯葛。同樣的，在非洲反種族隔離與反白人少數統治的歷史脈絡中，羅德西亞（今為辛巴威）與南非一樣是由白人少數統治與採取種族隔離政策，引發非洲其他國家以杯葛奧運作為壓力，要求國際奧會排除羅德西亞並拒絕其選手參賽。此外，1976年加拿大主辦蒙特婁冬季奧運，也讓台灣人記憶深刻。由於當時加拿大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杜魯道（Pierre Elliott Trudeau）總理領導的政府，希望台灣代表團以Taiwan名義參賽，拒絕台灣代表團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或任何含有China的名稱出賽。國際奧會雖然介入協調後，加拿大政府仍堅持不得使用任何含有China或Republic of China的名稱。在台灣中華奧會認為此一安排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有關國家名稱的規定，構成政治干預，最後選擇退出該屆奧運。上述這些案例清楚顯示，奧運雖以運動交流與公平競爭為宗旨，卻無法完全擺脫國際政治的影響。無論是主辦國的人權紀錄、戰爭與侵略問題、種族隔離體制，或是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時所面臨的名稱等爭議，都說明奧運會與國際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的事實。

其次，運動所面對的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防止運動暴力（violence in sport）：在運動競技場上，足球場上經常發生運動暴力的狀況，最具體的案例就是早期西班牙職業足球就是以踢法殘暴著稱，1990年代當時最優秀傑出的選手第一目標都是到義大利職業足球隊去發展，除了Juventus、Inter Milan、AC Milan等豪門球隊之外，其他成績排名第六或第七的足球隊也都有國際巨星願意加入踢球。同一時期的西班牙職業足球，普遍流行背後鏟球的踢法，導致不少運動員因此而受傷，歐洲足總見事態嚴重，採取重懲手段一旦出現殘暴的踢法，裁判立刻亮出紅牌，不需要再適用累進判罰、黃-黃-紅的順序，後來大家都學乖，有效遏止運動暴力的情事發生。可是，如今我們應該更在意的是運動旁的暴力（violence by sport），運動旁暴力的主要加害者，大多數是教練與經理等各式各樣周邊的行動者。對此，德國國會四年前成立一個專門調查運動中暴力的小組，發現運動中暴力普遍出現在許多運動項目中，其中以體操最為嚴重，最後德國透過立法成立一個國家級運動暴力防制中心。林教授重申，真正的運動精神，不只是追求卓越成績，更在於讓運動員能夠在尊重、保障與支持中完整成長，不應只為奪牌與勝利，犧牲身心健康與踐踏人格。在歐洲各國都會發生運動暴力的情事，很難相信這一類事情不會發生在台灣，我們的運動主管機關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促進運動的公平競賽（Fair Play），所謂的公平競賽，不只是在一個全球都接受的運動規則下，交由一個中立的裁判來決定最後競技的結果，而是在運動的所有參與、訓練、互動、競技到競技結束之後、乃至於面臨失敗的過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的意義。中國百十公尺跨欄的代表性選手劉翔，他在2004年雅典奧運獲得冠軍，



隨後又在多項世界大賽贏得金牌，創下世界紀錄，2008年北京奧運，他雖然被寄予衛冕厚望，但是沒想到在預算表現灰頭土臉，最後因傷退賽，被視為國家的奇恥大辱。其實，運動不應該變成這樣，運動有成功的一面，同時也有失敗的一面，面對運動我們如何以正確的態度看待所謂的「失敗」非常重要。

最後，林教授進一步從國族主義的角度，討論國家認同與運動之間的關係。他援引著名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於1990年出版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一書，民族主義問題提出重要的歷史性分析。Hobsbawm批判民族主義常以古老傳統、共同血緣與連續歷史作為自身的正當化敘事，但這些敘事往往帶有被捏造與虛幻的成分。事實上，民族主義不應被簡單理解為虛幻或不真實；它更是一種被歷史建構出來的社會與政治事實。從這個角度來看，1998年克羅埃西亞參加法國世界盃足球賽，便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南斯拉夫內戰告一段落，克羅埃西亞獨立不久，這個新興獨立國家首次以自己的國家隊身分登上世界盃舞台，並一路踢進四強，最後奪得季軍。對克羅埃西亞而言，這不只是一次成功的體育競賽，更是帶來國家的榮耀，也強化了人民對國家共同體的情感連結。因此，運動場上的國家認同，不能只被視為表面的激情或政治操弄，它往往是在特定歷史處境中，透過競賽、象徵與群眾情感自然凝聚而成。克羅埃西亞在1998年世界盃的案例，正好說明了運動如何將國家認同與民族共同體，從抽象的政治概念轉化為人民可以共同感受、共同記憶、共同認同的具體經驗。

林教授總結指出，運動常被視為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人們追求競技勝利、證明自身實力的意圖，始終存在。因此，運動場上的國族情感不必然被視為煽情或不理性的表現，可以用較平常心來看待。在此，所謂「認同」，往往來自人們對「我們」與「他者」的辨識。認同是一種真摯的情感，不必然出於特定政治目的，也不一定是人為操作的結果。台灣選手在國際賽場上有優異表現時，台灣人民自然會感到光榮；相對地，中國選手獲得佳績，台灣社會通常不會產生同樣的集體榮耀感。由此可見，運動中的認同未必需要透過「統一」或「獨立」的政治框架來解釋，因為運動本身就是人們情感投射與共同經驗的一部分，認同也往往在其中自然形成。林教授進一步指出，認同的範圍可以向下連結地方，也可以向上提升至國家層次，甚至延伸到族群或人種的想像。非洲長跑選手在1960年代崛起，或黑人運動員在美國NBA職業籃球場上的突出表現，都曾被賦予人種優越的象徵意義。1980年蘇聯舉辦莫斯科奧運，也曾被用來試圖透過運動展現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然而，從今日觀點來看，無論是人種優越、意識形態優越，或國家優越的主張，都應受到反省與節制。

真正值得珍視的，是運動競技本身所追求的公平與追求卓越。運動之所以具有崇高價值，不在於它能證明哪一個國家、族群或制度更優越，而在於它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場域，讓人類透過規則、努力與競爭展現能力。因此，我們應以更成熟的眼光看待運動：既理解其中自然產生的認同情感，也避免將運動過度工具化或意識形態化。◆